

大象人物日记文丛

茹志鹃

茹志鹃日记

(1947—1965)

整理者 王安忆

大象出版社

大象人物日记文丛

茹志鹃
茹志鹃日记
(1947-1965)

整理者 王安忆

大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茹志鹃日记(1947—1965)/茹志鹃著;王安忆整理.
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06.8
(大象人物日记文丛/李辉主编)
ISBN 7-5347-4286-2

I. 茹... II. ①茹...②王... III. 茹志鹃(1925—1998)—日记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68259 号

茹志鹃日记(1947—1965)/大象人物日记文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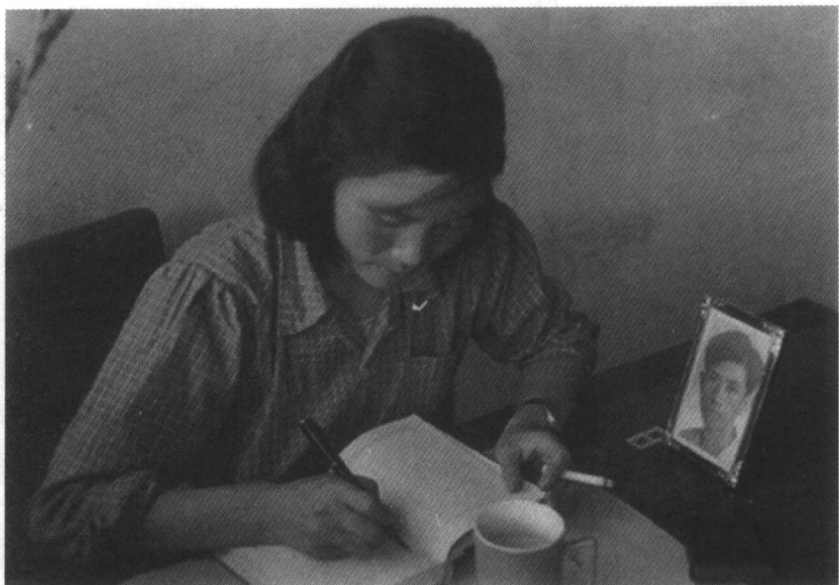
丛书主编 李 辉
整 理 者 王安忆
责任编辑 成 艳
责任校对 方 琴 吴春霞
书籍设计 王翠云
出 版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)
网 址 www.daxiang.cn
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科 0371-63863551
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
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640×960 1/16
印 张 13.25
字 数 176 千字
印 数 1—2 000 册
定 价 20.00 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商城路 231 号

邮政编码 450000

电话 (0371)66202901



茹志鹃小传

茹志鹃(1925—1998),祖籍浙江杭州,当代著名女作家。其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。笔调清新、俊逸,情节简单明晓,细节丰富传神,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。代表作品有《百合花》、《静静的产院》、《剪辑错了的故事》、《如愿》、《三走严庄》、《阿舒》等。

李 辉	文丛总序	『大象人物日记』
--------	------	----------

这几日，“非典”在北京肆虐。天上似乎总是罩着久久不散的雾霭。说是雾，却非雾；说是晴，也非晴，太阳遮遮掩掩地露出来，它也仿佛被某种莫名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。

生活仍在继续，但是一夜之间已与以往大大不同了。

生与死、勇敢与怯弱、高尚与卑微、果断与无能……人性的诸多美好与缺陷，都在这一时刻呈现出来。

对于生活其中的每个人来说，这些日子将成为终身难忘的记忆。未来的人们回望今天，也许会说：那一年中国的春天叫“非典”；正像今天的我们在回望一个又一个遥远或不遥远的年份时，会用特定的词汇来勾画历史的某一个环节一样。

在这样特殊的时刻，有人在每日记下自己的经历和感受，就像我们的前辈们当年一样。

日记就其本来意义来说，是最具个人色彩的一种文体——这里需要排除某些刻意写给世人阅读的日记。因为诸如此类的文字，看似个人化，其实早已串了味。那些为了迎合某一需要而写，或者被人为加工的日记里，很难看到记录者真实的思想和情感，它们的价值，无论是文本上的还是美学上的，显然是要大打折扣的——我所看重的是真正写给自己的日记。打开日记本，写下一行行文字，或是为了备忘，或是与内心交谈，把个人交往、行踪以及高兴、痛苦、愤怒诸多心绪均如实记下。这样的日记，无

论简略或者详尽,随着时间的推移,都将成为历史记录的组成部分,为人们认识记录者本人和历史提供大量真实细节。

“大象人物日记文丛”将陆续选录不同时期各界人物的日记,借他们对个人经历和心灵行程的记录,来多侧面地呈现历史原状。

不同的性情、不同的身份会留下不同风格的日记,从而也展现出历史生活的不同侧面。我很高兴在大象出版社的支持下,能够出版一套自成体系的日记丛书。我希望经过不断的努力,能有更多有价值的日记加盟到这套丛书中。

一个新的开始。既是文化积累,也是历史积累。星星点点的积累,把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。

在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春天,谨以上面的文字作为“大象人物日记文丛”的总序。

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于北京

目 录

1/走向盛年——《茹志鹃日记》序——王安忆

茹志鹃日记(1947—1965)

5/一九四七年

25/成长——王安忆

30/一九四九年

32/进上海记——王安忆

34/一九五一年

39/一九五二年

65/翻身的日子——王安忆

71/一九五四年

94/一九五八年

108/遭逢一九五八年——王安忆

112/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三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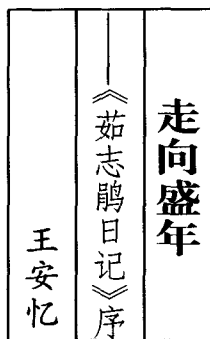
159/谷雨前后,点瓜种豆——王安忆

165/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五年二月

178/工人——王安忆

181/一九六五年三月至四月

200/东瀛初渡——王安忆



这里总共收入我母亲茹志鹃的日记十段,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五年,纵贯我母亲二十二岁至四十岁,十八年的青年时代。是从我母亲留下的大量日记和笔记中抄录整理。所以是这一些而不是其他,理由很单纯,就是从那些字迹清楚、记叙流畅的着手。最先整理的是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三年,在上海郊区蹲点的日记,其间遇上海解放五十周年纪念,于是将一九四九年进上海记赶先整理出来,发于《解放日报》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,“一九六〇与一九六三”倒滞后发表于一九九九年第十期《上海文学》;然后是一九五二年马鞍山日记,发表于《阳光》一九九九年第六期;此后又有一九四七年的土改日记,发表于《十月》二〇〇〇年第四期;一九六五年访日日记,发表于《万象》二〇〇三年第五期;一九六四年四清日记,发《主人》二〇〇三年第八期;再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采访,发《江南》二〇〇六年第三期。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未曾发表,前者是因为短小简单,似乎难以独立成篇,但放入这一系列中,却可起连接作用;关于后者,我将在下面谈到。

整理中,一九五二年、一九五四年、一九五八年、一九六四年的日记有一些删节,因这几段日记以采访为主,所删部分多是访谈对象的述说。有一些是重复,有一些语焉不详,还有,就是一九五八年,许多是数字、报表,就需要将数字的中国字写法与阿拉伯数字写法统一。再说要有什么改动,就是错别字和笔误。

这里的十段记载,大约占母亲日记的三分之一,要待全部整理成章,

不知要到何时。我有自己的文字工作要做,因是母亲的遗作,我又不愿请外人帮助,所以,进度很慢。此时,翻检一遍,发现已够一本书的字数;再则,时间与内容,也相对完整,于是决心成书。

我很惋惜的是一九四七年的日记,那是一些残页,显然之前和之后还有记录,可经过动荡不安的年月,只留下这么几页。其中所记的土改运动,无论与主流性的革命文学,还是边缘如张爱玲的《秧歌》,或是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反省性写作,都有所不同。一九四九年的日记只有几日,甚至称不上是日记,只是一些即时即景写下的文字,但因是转折的关头,我还是保留了。而且我很喜欢那景象,我母亲一定身处挺进上海的卡车里,特别兴奋。

日记中大部分是采访工作的记录,其间只隐约透露出一些个人生活的轨迹,只有一九五四年,母亲记叙了比较多的心绪。很明显,母亲和父亲之间出现感情的低潮,这也是我最后才决定收入本书的一段日记。身为儿女,难免会将父母间的龃龉看得过分严重,倘若持客观态度,也许就觉得很自然。其时,父亲三十五岁,母亲二十九岁,婚龄则为四年,是一对年轻的夫妻。他们方从传奇式的战争生活中走出,进入平常日子,养儿育女,所有安居的琐细全都扑面而来。与此同时进行的,是母亲在南京郊区深入生活,与一名女劳模结成朋友,这名村姑正谈婚论嫁,我母亲则为她出谋划策。日记最终结束在新人成婚之际,而我母亲停止日记,大约也因为夫妇感情走出困境,阴云驱散,是令人欣慰的。

日记中可以见得,母亲将写作视为事业,一直苦恼着如何在写作上有所成就。她贪婪地收检材料,认识时代。随着时间推移,她的心情越来越从容,渐有了自信,但却并不松懈努力。至一九六五年,与前辈作家老舍、杜宣、刘白羽、张光年同团出访日本,这从某方面表明她已获得承认。回眸十八年前,一九四七年的土改日记,可谓进步甚大。这十八年,我母亲从一个战士成长为小说家,历经反右、“大跃进”、四清等屡次政治运动,也从一个少女变成母亲。日记里她记录了我们三个孩子的出生,终到了年富力强的四十岁。之后,就是风云突起的一九六六年了。

2006年5月4日 上海

茹志鹃日记

(1947—1965)

一九四七年

十一月四日

在前两天我们已经进入了黄泛区,据刘主席介绍这里是一个较富裕的地方,我们开辟好了。这儿的地形很好,可以作我们中心区,我们要在这里安伤兵,在这里做后方,在这里搞供给等。

在昨天我们到了沈太鹿的县政府(新划出的新县),何时下去工作不知道,只不过他们干部太缺少,对我们是非常欢迎的。

在一路上来我们进行了学习,关于土地法等,顾绛有一次发言说:“当开大会斗争地主,要在当场把他们打死或撕碎,我不敢相信自己掩目不敢看的事情会否产生。”这是她在未做前就不敢相信自己,而就说这样失去立场的话,应当相信自己,应有“能够”这样的信念。当敌人的刑法加到同志身上,这些哪是人的肉体能够经受的呢?这都是意志和信念支持着他的。

昨晚和今早把候补期中的思想检查写好了,大约要总支批是等到回去才能了,马旋的组织问题也未经总支批,就参加组织生活了。

今天晚上要组织晚会,节目还是以前的小节目。

这儿一带的老百姓都是这样,见自己比我们吃得好,都好像非常过意不去似的,这里面包含了什么新的意义?

十一月十一日

组织是重新分配了,四组与三个女同志跟朱部长去开辟新地区,我们这儿是粗枝大叶的组织建立起来了,但群众是未发动起来的。

工作从昨天开始。是准备先用两天时间,在这个区的中心,秋渠集的附近做调查研究工作。一方面是在这中间熟悉一下群众工作,从已有的组织中去学习一些经验;另一面是去调查一些现在工作中,干部的缺点偏向。在这个地区从前是来了一个刮大风到处点灯,到处冒烟的办法,在半天内逮捕了六十多个地主,从分浮财中产生农会,其实真正几千年的封建枷锁三拳两拳是打不破的。

昨天和苏平、钱忍发一起一个组,由章队长带着向东去。

走在高低不平的才犁过的地上,抄近路出发到东面的第一个行政村去。早晨的太阳不太热,风相当大,有些冷,走了五六里地才到。刚走到庄头碰到区里的一个同志,见他穿了一身便衣,腰带上斜别了一根短枪,好像是一个侦察员,后面是背了根步枪的区丁。我们走近他,他和带我们去的两位同志小声地谈了几句话,就匆匆地走了。原来在东面五六里地的王小楼有土顽一部二三十人,叫我们小心。我们进了庄就召集这个行政村的翻身队(他们叫看家队,根据他们的认识,和具体情形起的)放哨,在这个村中放了一个组下去,另两个组继续带了几个看家队往前走。走有三里地,到了第二个行政村,章队长和另一小组留下。因为我们这个组好像比较强一点,所以叫我最前哨去,于是我们带了两个看家队员和区里的同志再向前走。我们去的这村离王小楼只一里路,所以警惕心提得较高。快到庄前见庄边的地上有许多老百姓在做活,心里想,要是土匪伪装的,我们去了,倒不好玩了,故在旁边一个老百姓中先打听一下,知庄上无情况才进去。村长和农会长很客气地把我们引到一个公学中坐下,又拿烟,又叫烧茶,又让坐地忙了一阵子。我们先叫一个老百姓到王小楼去探听一下敌情,一看屋里有一个教书的老先生在,自己心中感到这里说话要留个分寸。村长和农会长的作风态度都不像一般贫农的样子,既不朴实,又把我们当作视察员似的看待。一了解成分,一个原来是商人,一个

是干过国民党县政府的工作的富中农。这是区里来布置选举的，为什么会布置到他们俩头上去，这其中一定是有妥协、不彻底的成分。也许还有些感情作用，想他们在村中原来有些威信，有些能力。但这原来的威信是在什么基础上面的呢？地主也会有威信的，或许，而且也定会这样，也像一般部队喜欢俘虏一样，因了技术关系。而地方上也会因这些人能干一些，大胆些，灵活点，也是有的。对一些基本群众，迟钝点，接受力较差，就不耐心。

到吃饭时端上来五个菜，白面饼，又是酒又是面条，这些钱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当然是摊派在老百姓身上的。他们日常招待的香烟都是记账的，然后到时再分摊。他们用旧的一套，或许还对我们有些害怕的心理来对我们，从中自己也可以大吸大吃。

谈话时问到农会和村长的人口地亩的数目，村长马上就提出，他不干、干不好的话来推。其实他心里何尝不想干，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是此地的“开国元勋”，工作还不坏而明明故意提，想要探点我们对他的见解的口气。

老百姓回来报告王小楼并无敌情。

吃完饭我们三人分散到三个自然村去。因情况不明，老陈（通讯员）由我带着，和另一位工作同志，三人就向俞庄出发（村长家是在俞村）。到半路上，在我们右方跑来一个气喘喘的老头子，他极力想使自己的呼吸平静一些讲话，但他终于连喘带说，轻轻地告诉我们，在他们那庄上有二三十个土匪才来到，他从庄后溜出来报告的。我们问：“你庄在哪里？”“努！”他用手一指离我们有二百米远的一个庄子。我们听了，急忙向前走，预备写信给区队来打，因为走得太快，竟使我忘了回头看看这位大爹是否还是回到他自己庄上去！我想他可能是不会回去的。

我们到了俞庄写了个条子，叫了一个可靠的老百姓飞快地去报告区部了，土匪所在的那个庄离俞庄只有里许，我们还是照常地工作，只不过叫老陈有时去监视一下。

俞庄的自然村长是个贫农，也是个打铁匠，一见了我们其态度显然和

他们不同。他一定要叫我们进到他那小屋里坐(其实是蹲了),这种诚实的态度和我们刚才吃饭时的客气及出门时,在外面吃饭的老百姓,好像是在一声口令下,不先不后都端了饭碗拿着饼站起来,经过面前时都要说一声“吃罢了?”“吃咱的面条!”或“吸烟吧?”之类的话,使我轻快得多,自由得多,把刚才存在心里的难受、别扭都打消了。我进去就蹲下来,他也不客气,也不让坐也不叫吸烟。他没有经济基础,铁匠家里除了一张铺,一个打铁的风箱外,只有他一个十七岁的儿子。铁匠在儿子面前毫不掩饰他的以有儿子为得意的情绪说:“这是俺八亩地里出了这一个豆角子!还怪铁!”我问起他看家队人数时,他正经地答道:“从十八岁到四十五岁下的都是。”他们都愿意参加吗?旁边一个老头子乖巧地答道:“只有我不愿意。”他说的话也是真的,可也不像他所说的都愿意。土匪不但是给村干部找麻烦,他们见了老百姓有事没事都得揍,所以一般老百姓都恨透了。抢当然是,故组织看家队保护自己家不挨土匪抢,是没啥大不愿意的。从他“十八至四十五都是的”这句话中可以看到真正群众发动起来的程度了。

自然村的干部成分虽好,但未经教育,并始终掌握在行政村手中。

回来时天已全黑,队长着急得很,我自己也疲劳得要死。晚上移了几里路,章队长传达区党委的报告,关于如何掌握积极分子。我强迫自己去听,睁开眼睛,但我只听到了一句句连串的话音,我已失去了思考报告中的话意,从来我没有在自己喜爱的报告时打过盹,但此刻熬不住了。

十一月十二日

因移了地方,我们今天就在附近的几个村中进行调查了解,我们三个人到××村,因接受上次经验(一个人先去和干部谈,再要离开干部和群众谈不方便),先去找老百姓谈。

大爷啊!你贵姓?

姓王。

大号儿呢?

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唉！俺穷人上不起学，没大号，俺小名叫全儿。”他说后又尴尬地咧开嘴露出了一颗黄牙齿笑了，他想到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年纪有些不大配。

在乡村间连起个名字都要一定的经济基础，在名字上有着严格的阶级的区别。

问起他庄分浮财的情形，他说一共哄了四家，他说：“人家三十二亩地，八口人，就该哄了吗？”“你说呢？”“我说不该哄，人家小弟兄仨，没做啥恼人的事，我说不该哄。”他带有一种农民特有的固执，又重复了一句。他们这庄上是这样的，是别庄的看家队带老百姓来哄的，本庄上反而没拿一点东西。一方面是不叫拿，主要方面还是本庄人不好意思去拿。经过调查，该家只能说是一个富中农。在群众没有真正从阶级认识发动起来，就带他们到处点灯到处冒烟的搅起来，他们是会犯一种是非不分的抢劫行为的。

我又走了几家，和另一个正擗面的壮年人谈到农会的事。我先准备好的一些问题，经过他简单局促的回答“不知道”、“没听说”等的话，我已不知该如何问，该问些啥了。他又呆呆地坐着，我静默着，在这种时候是最难受的，我不知怎样去取得我面前这个又怀疑又有些害怕、老实而简单的人对我的信任，难极了。要赶快想出一个问题来问他才好，再静默一分钟的话，他一定要借故而出。男人一走，女的也会接着拿个筐，拍拍走出去，老太婆也会拍拍身上的灰站起来的。“这正是因为是中农或者富中农啊！”到那时你难道能够这样埋怨吗？

到村干部那儿去，原来自然村长就是那个全儿，家里薄地一亩一口子，成分不差。农会长也怪好，其他村里没有会，他已经有了三十个会员。地亩册子也有了，虽然是登不好，太简单。看样是很老实，也较积极，但上面对他们关心较差，还没划行政村，也没到那儿去过。苏平主观地光问他，口气里带着责备：“你们农会开过会吗？”“没有，俺也知不道咋搞。”“为什么不开会呢？”“你叫我开会，他们人来了，叫我说点啥？总不能眼睛对鼻子坐一会儿呀？”

别说他是还未经我们教育过的人，就是教育过一段时间也还许多地方不了解的。像他们在工作上一一定有很多困难，但他要你来帮他解决又有很多顾虑，矛盾。直接的责怪、发问还不如教他如何做，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来得好。

十一月十五日

去刘桥工作一天。一去到一间坏茅屋，半间是给牛占了，半间是一张大床。这是一家推发为业的穷人，无田。召开村干会（因没农会会员）。所谓村干会其实也不一定，凡是关心而大胆对均地的事的人都蹲在那里听，无论是穷人无论是地主、富农，都想来探听初来工作的态度。坐在我对面一个矮矮胖胖，一张短而方的蟹脸，两撮小胡子，他一面听一面拼命地点头，等我讲完后他是首先发表感想。首先他提起的是李区长：“李区长刚来的时候，我如何如何，这个区都是我帮助搞起来的呀！李区长的为人怪平和。”当我注意到这个人，问起他的出身时，他含糊地说出自己有一二十亩地，以后马上就接上说自己在这次均粮时拿出十来多石粮。会长也忙接着说：“唉！他自己只剩下几斗粮食，有五口人吃。”一边又递过烟来。又问了些其他问题，干部都走了，我就和那屋里的主人刘冬儿拉起来了。他习惯地抬起眉毛使他的眼睛诉起他的罪，谈到苦处眼圈儿红了。时机成熟了，抓住这时问他。我指了指刚才那矮个坐过的地方轻声地说：“他有多少地？”他用大食两指比了比，轻到不能听，但看了他的手势已明白那人有八十亩地。“咱庄姓刘的穷一点，姓陈的富一点，陈家的侄子是保长，他大爷当村长，他是十来年的甲长了，这次他们要选姓陈的当会长，老百姓不服，他办事不公，所以他——”他也指了指国玉坐过的地方，“选了这会长，副村长是他的哥，他出面，后面是他——”他使劲地在空中抓了一把，“会长是他说啥听啥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下巴向我一翘，眉毛又抬起，额上弄起了好几条皱皮纹，一只手掌向下，猛地向下一压，“老百姓不敢吭气儿啊！”他又轻声地补充地说道，“他还是大把掌握。”陈国玉在门口转了转，又出去了。冬儿又告诉我，他当保长时自己私自作主卖刘新镇

茹志鹃日记（1947—1965）